

新
中国制度研究丛书

主编 潘世伟



Xin Zhongguo Wenhua Guanli
Tizhi Yanjiu

新中国文化 管理体制研究

蒯大申 饶先来 著

05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
中国制度研究丛书

主编 潘世伟

新中国文化 管理体制研究

蒯大申 饶先来 著

⑤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蒯大申,饶先来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新中国制度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09251-8

I. ①新... II. ①蒯...②饶... III. ①文化事业—管
理体制—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3017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封面设计 储 平

· 新中国制度研究丛书 ·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

蒯大申 饶先来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328,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251-8/D·1719

定价 40.00 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绪 论 / 1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内涵与外延 / 1
- 二、制度及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 / 4
- 三、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8
- 四、本书结构安排 / 17

第一章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的历史条件 / 21

第一节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的思想理论根源 / 21

-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22
- 二、文艺服从于政治 / 24
- 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 26
- 四、对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认识 / 28

第二节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的制度渊源 / 35

- 一、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宣传教育体制 / 35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 / 38
- 三、延安时期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 / 40

第三节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的政治背景 / 53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本政治制度 / 53
- 二、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 / 64
- 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 / 70
- 四、新中国的外交方针 / 74
- 五、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体制对文化管理体制的影响 / 77

- 第四节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的经济背景 / 80
- 一、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并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 / 80
 - 二、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 82
 -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 87
 - 四、建立计划经济体制 / 89
 - 五、计划经济体制对文化管理体制的影响 / 94

第二章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初创与建立 / 98

- 第一节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初创 / 99
- 一、《共同纲领》的指导思想 / 100
 - 二、新中国文化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运转 / 107
 - 三、思想改造与文艺界整风 / 123
 - 四、文化事业体系的改制与转型 / 128
 - 五、仿效苏联文化管理模式 / 139
- 第二节 一体化文化管理体制的确立 / 143
- 一、服务于总路线的文艺政策 / 143
 - 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 145
 - 三、文化政策的调整与文化管理机构的加强 / 151
 - 四、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与“双百”方针的制定 / 154
 - 五、一体化文化管理体制的建立 / 160
 - 六、新中国初期的文化成就 / 162
- 第三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管理体制的强化 / 167
- 一、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动 / 167
 - 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 / 168
 - 三、一体化文化管理体制的强化 / 181

第三章 文化管理体制的破坏与蜕变 / 183

- 第一节 文化管理体制的破坏 / 184
- 一、文艺批判演变为政治批判 / 184
 - 二、极“左”的文艺政策 / 191
 - 三、“突出政治”的文艺审查制度 / 195

- 第二节 文化管理体制的解体 / 197
 - 一、“文革”爆发对文化管理体制的冲击 / 197
 - 二、文化管理体制的解体 / 199
 - 三、队伍的解散与个人的改造 / 203
- 第三节 文化管理体制的蜕变 / 207
 - 一、“文革”中的文化领导体制 / 207
 - 二、文艺生产的高度程式化与政治化 / 214
- 第四节 “文革”后期文艺政策的调整 / 217
 - 一、周恩来对极“左”文艺路线的抵制 / 217
 - 二、邓小平对文化领域的整顿 / 220
 - 三、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 / 221

第四章 文化管理体制的拨乱反正 / 222

- 第一节 新时期前期的文艺政策 / 223
 - 一、推翻“两个估计” / 224
 - 二、文艺界对“黑线专政论”的批判 / 225
 - 三、中共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 / 228
- 第二节 真理标准的讨论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229
 -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230
 -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 232
- 第三节 文化管理机构的重建 / 233
 - 一、宣传文化领导机构的恢复与重建 / 233
 - 二、文艺界领导机构的恢复与重组 / 238
- 第四节 文化管理体制的正常化 / 241
 - 一、文化管理工作机制的重建 / 241
 - 二、文化政策的调整和校正 / 252

第五章 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253

- 第一节 文化管理体制的变革 / 253
 - 一、对文艺管理体制的反思 / 254
 - 二、文化管理体制的革新 / 255

三、文化市场的发展及监管体制的建立 /	260
第二节 文化管理体制的转轨 /	262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文化体制的转轨 /	263
二、“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与文化产业的崛起 /	265
三、文化法制建设的进展 /	266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管理体制的建设 /	267
一、WTO 背景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	269
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展开 /	271
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	274
四、网络文化管理体制的初创及其发展 /	278
 第六章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	281
第一节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建设的成就 /	281
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	281
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国家文化管理体制 /	283
三、构建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体系 /	284
四、建立了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 /	285
第二节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建设的历史经验 /	286
一、要正确认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	286
二、要按照文化建设本身的规律和特点来领导文化 /	288
三、要充分重视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	289
四、要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文化多样性问题 /	291
五、要为文化发展提供法律的制度保障 /	292
 参考文献 /	294
 后记 /	301

绪论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内涵与外延

文化管理体制,是指国家^①管理文化事业、文化活动的组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本书研究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管理文化领域的组织体系及其职能和具体运行机制,党和政府与文化单位、文化人之间的关系,管理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等。当代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思想理论、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网络媒体、对外宣传等各个方面。一定的文化管理体制是一定政治体制的派生物,同时受到一定经济体制的直接影响。文化管理历来被视为政治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说法,限制和规约艺术生产(包括文学生产)的体制性力量包含以下各个方面:“作品科学不仅应考虑作品在物质方面的直接生产者(艺术家、作家等等),还要考虑一整套因素和制度,后者通过生产对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价值和艺术品彼此之间差别价值的信仰,参加艺术品的生产,这个整体包括批评家、艺术史家、出版商、画廊经理、商人、博物馆馆长、赞助人、收藏家、至尊地位的认可机构、学院、沙龙、评判委员会等等。此外,还要考虑所有主管艺术的政治和行政机构(各种不同的部门,随时代而变化,如国家博物馆管理处、美术管理处,等等),他们能对艺术市场发生影响:或通过不管有无经济利益(收购、补助金、奖金、助学金,等等)的至尊至圣地位的裁决,或通过调节措施(在纳税方面给赞助人或收藏家好处),还不能忘记一些机构的成员,他们促进生产者(美术学校等)生产和消

^①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主要是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费者生产,通过负责消费者艺术趣味启蒙教育的教授和父母,帮助他们辨认艺术品,也就是艺术品的价值”。^①也就是说,文化制度既包括了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等各个方面,又涵盖了国家和文化界管理和调节文化与社会关系的一整套体制、机制。

文化管理体制的演变史既是文化史,又是制度史。^②因此,本书的任务既是研究当代中国的文化制度史,又是从制度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文化史,主要是从历史角度考察当代中国文化的制度环境。

制度的基本功能在“制”和“度”两个方面。一是“制”,即规范(用作动词),就是从正面规定“应该做什么、如何做”和从反面规定“不许做什么”;二是“度”,即标准,就是制定和提出“不许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的依据和规则。就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而言,其功能主要体现在:(1)制定管理全国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2)规范全国文化机构、文化组织、文化单位、文化人在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活动中的行为。

从文化管理体制构成的角度来看,文化管理体制由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手段、管理理念等四个要素构成。(1)管理主体,是指管理行为施行的主体,是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主体。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制度主体是由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党政文化主管部门所构成的管理系统来承担的,这个管理系统呈金字塔形,其运作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2)管理对象,是指管理行为施行的客体和范围。管理对象既可以是组织、机构和自然人,也可以是资金、资产、事项。一个部门、一个机构可以同时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双重属性。比如,对地方文化主管部门、文化机构、文化组织来说,中央和国家文化主管部门、文化机构、文化组织是管理主体,地方文化主管部门、文化机构、文化组织是管理对象;对基层文化机构和文化组织来说,地方文化主管部门、文化机构、文化组织又是上级管理部门,是管理主体,而基层文化机构和文化组织是管理对象。总之,一般来说上级是管理

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277页。

② 关于“体制”与“制度”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学界有不少辨析。但是从目前的汉语文本来看,无论是官方文件、学术论文还是一般文章,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尚未有明确区分,在日常话语中也是难分轩轾。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对“Institution”一词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了说明。这个词既有“制度”的含义,又有“机制、机构”的含义。在19世纪,“Institute”被广泛使用在职业的、教育的研究机构,“Institution”则用于慈善机构。到20世纪,“Institution”已经成为一个普通的词,用来表示一个社会中任何有组织的机制。参见该书中文译本(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42—243页。本书将文化管理体制研究归入制度研究的范畴。

主体,下级是管理对象。(3)管理手段,是指管理主体为了实施管理所使用的管理工具。政策、法律法规、奖惩办法、资源配置方式、机构兴废或升级降级、人员安排,都可以成为管理的手段。^①(4)管理理念,是指制度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制度,管理之所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管理,其背后秉持的理论和思想观念。理念决定着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倾向,理念的变革是制度变迁的先导和基本动因,决定着制度演变的方向。一定的管理理念是一定的管理制度产生的思想理论根源,一定的管理制度也是一定的管理理念的外化和体现。管理理念既体现为管理方针和管理目标,又表现为管理要求和管理手段。在文化管理体制四要素中,管理理念是灵魂,其精神和倾向必然体现在另外三个要素之中。

在上述四个要素中,管理主体关注的是“谁来管”的问题,管理对象关注的是“管什么”的问题,管理理念关注的是“为什么管”的问题,管理手段关注的是“如何管,用什么方式管”的问题。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互为对象,管理手段与管理理念形同表里。四个要素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共同构成管理体制的完整系统。

上述四个因素又都从不同角度对制度发生影响,产生作用。“任何制度分析的核心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制度如何影响个人行为。毕竟,制度是通过个人行动才对结果产生影响的。”^②制度规范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对制度管理下的个人和组织施以重大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也时常对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施以影响。且不说制度、政策设计者和执行者的行为和活动会对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构成重大影响,即使是被管理者的行为和活动也会对制度产生深刻影响。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变化,更是时时引发制度的变革。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③

①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② 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9页。

二、制度及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制度对于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长期在中央高层担任领导职务,“文革”中遭贬,被逐出领导层,这反而使他获得了一个观察体制、反思体制的宝贵机会。入乎其内,故能知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曾经“身在此山中”的人,出来后更能看清“庐山真面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把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当谈到对毛泽东错误的看法时,邓小平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①他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②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③许多顽症痼疾(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都“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④“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⑤。因此,“领导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7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51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3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8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8—329 页。1956 年 4 月 28 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在制度上的中心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集权集得多也有好处,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搞起来了。但是,也有毛病,也带来了阴暗的一面,就是容易缺乏民主,忽视民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很容易生长出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东西保留下来,甚至更加浓厚起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69 页。

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①1980年8月,当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时,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②基于这些根本认识,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的任务,他认为只有对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③

改革对当代中国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考察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进程,可以发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一个核心环节。改革,“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始终是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为主线的。

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对30年来的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作出如下概括:“我们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④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度保障。”^①当代中国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丰富了我国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的内涵,同时也对我国制度变革的更进一步深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制度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对制度变革重要意义的认识,也充分反映在各个学术研究领域。在经济研究领域,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近30年来得到了广泛共识。把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场深刻革命。传统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但是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仅有上述三大支柱是不够的,对制度的忽视严重阻碍了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大大限制了经济学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世人证明,制度应当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支柱,对于理解经济增长的规律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并不是生产要素的简单相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技术这些生产要素,因为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有关制度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分析应该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其实,制度分析的方法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所独有的,它也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方法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深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诺思(Douglass C. North)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②

新制度经济学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把制度问题推向了经济学的前沿,特别是它明确指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互补性)以及作为向市场制度提供基础的政治结构(并非是前者的替代物)的特征等。新制度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和分析工具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增强了经济学的解释力。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对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对包括政治学、法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受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启发,一些政治学家把

①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

②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8页。

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引入政治分析。自从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en)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之后,“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吸引了越来越多政治学者的注意。^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研究已处于当代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这是因为,政治学学者们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要理解不同社会系统存在的发展差异,政治制度是最重要的解释性因素。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分析途径不断拓展,学术队伍迅速扩大,学术派别日趋细化。尽管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各自采用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分析路径,各自具有不同的理论特征和不足之处^②,但是这些学术流派还是拥有鲜明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共同认为,制度因素是社会分析的最佳出发点,制度为人们的行为创造出大量的调节性规则,制度是人们主观性行为的限制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社会科学各领域对制度研究的高度重视,是回应和解答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需要,这既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所面临的新挑战的回应,又是对新兴工业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国家各种制度需求的回应,同时也是近几十年来不同制度系统之间国际竞争的需要。

近年来,在我国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文化体制和文化制度问题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洪子诚曾在《问题与方法》中对此现象作过一个简要概括:“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和文学体制、文学生产的方式关系很密切。对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研究,过去我们不太重视。至少在文革以前的五六十年代,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界里。在‘新时期’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注意。这个情况,和中國大陸社会学研究的恢复,重新开展,有直接关系。对文学生产和文学体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③比如,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张利群的《文艺制度论》、范国英的《茅盾文学奖的文学

① 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关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彼得·豪尔(Peter A.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C. R. Taylor)于1996年发表在英国《政治学研究》杂志上的论文《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提出了“三分法”,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这一划分得到国际政治学界公认。该文中译本参见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0页。

制度研究》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文学制度和文艺制度的研究,不同程度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文化制度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三、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化体制、文化制度对于文化现实、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研究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深入认识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运作特点,是认识和了解当代中国文化形态和发展特点的关键,也是认识和了解改革开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关键。

对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制度”和“制度史”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充分认识文化领域的制度建设、制度变革在新中国文化建设和国家意识形态形成、巩固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加深对文化管理体制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管理制度之间的丰富关系的认识,从而深化对制度重要作用的理解和认识;二是可以加深对文化管理体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加深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也将丰富和深化制度史、意识形态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从而为文化制度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历史借鉴,起到“以史资政”的作用。

任何国家都有一套管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制度。“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制度安排或工作规则形成了社会秩序,并使它运转和生存”^①。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约束和限制人的行为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活动。在制度许可的界线以内活动,便得到许可、赞赏、鼓励,超越界线活动,则受到排斥、谴责和打击。新中国成立初期,迫切需要稳固新生政权,这除了依靠专政手段,迅速建立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秩序之外,还需要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合法化。^②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政治学习运动和宣传教育,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理论基础^③,另一方面则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

①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② 毛泽东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786页。

③ 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整肃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促使知识分子转变立场,服务新社会。^①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系列文化管理体制的创建和有效运作,为新中国新政权、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文化管理体制的视角切入,使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新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和运作特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延续了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整套党直接指挥管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与模式,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一是通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党政合一”,实现对国家政权的全面领导;二是党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一切国家机关均成立党的委员会,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事务的领导和管理;三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委、院、署各级国家政权机关中建立党组,按大行政区建立各级党委,同时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保证中共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得到贯彻执行。

通过这种方式,在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层面上,党很快建立了全国范围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系。1950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开始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试行建立宣传网的工作。195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将此制度迅速推向全国。同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②,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宣传部的机构设置和职责范围,甚至对“各级宣传部长应是党委委员或常委之一,或使其参加党委的会议”等制度细节作了规定。这些规定不仅在组织体系上全面建立起党对文化事业、文化工作的集中领导,而且形成了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领导管理制度,其中包括对新闻报道、政治理论教育课本、各类出版物、电影、剧目和重要艺术品的审查制度。在社会层面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迅速完成了全国文化领域的国有化。^③

只有对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有了深入了解和认识,我们才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生产方式、文化组织方式的“一体化”特征^④,以及文化形态、文艺创作方法、艺术风格日益趋同化和文艺高度政治化的

^①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9页。

^③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形成的经济背景”。

^④ 洪子诚指出,所谓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即“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文学规范……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的‘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倾向,从而加深对中国当代文化史的理解。

同样,通过对文化管理体制发展演变史的深入研究,也可以深化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文化的方针和政策是文化管理体制的核心要素,当文化方针、文化政策符合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时,就有利于保障、鼓励、促进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有利于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就繁荣,就发展,反之,文化就萧条,就停滞。“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度集中统一的文化管理体制和频繁的政治批判运动,对于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和文艺创作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大规模政治批判运动的方法来解决,必然会混淆思想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在政治高压态势下,学术上、艺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容易使思想学术论争流于简单化和片面化,依靠行政命令和无情斗争的手段来实施对文化艺术的领导,其结果必然是严重束缚和制约学术的发展和文艺的繁荣。

1956年,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林默涵撰文指出,现在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①李维汉也认为,1954年以来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运动,对推动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中也产生了简单粗暴的现象,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视为“思想敌人”,混淆了政治问题与学术性质问题的界限,“造成一些知识分子惶恐不安的疑惧情绪”。^②50年代,在经过对影片《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之后,电影界一直较为沉寂,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很少。就连毛泽东1955年10月也说,印度的影片一星期有好几百万人看,我们自己的片子则很少人看,这就是人们以不看的法子来批评,因为没有味道,引不起兴趣。做得不好,人家总是要讲话的。文艺中的形式主义是弱点,千篇一律不好,要依情况出发,要入情人理。^③1957年3月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毛泽东又说,“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日本八千多万人口,去年出三百多部故事片。中国六亿人口,才出三十多部”^④。1956年11月14日,《文汇报》发起了“为什么好的国产影片这样少”的讨

① 林默涵:《两年来的短篇小说》,《文艺报》1956年第4号。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07页。

③ 毛泽东1955年10月27日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5期。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